

新華半月刊

XIN-HUA BANYUEKAN

慶祝建國十周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刘 少 奇(1)
伟大的十年	周 恩 来(10)
高举党的总路綫和毛澤东军事思想的紅旗阔步前进	林 彪(19)
中国人民大团结和世界人民大团结	邓 小 平(25)

論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大跃进	李 富 春(29)
高速度发展的我国鋼鐵工业	王 鶴 寿(33)
十年来的机械工业	赵 尔 陆(37)
紡織工业光輝的十年	蔣 光 鼎(42)
铁路十年	呂 正 操(44)
高举总路綫的紅旗, 加速发展交通事业	王 首 道(47)
高速度地进行建設	刘 秀 峰(51)

十年来农业战綫的光輝成就	廖 魯 言(54)
歌頌人民公社	陶 鑄(60)
高举紅旗, 大搞水利运动	李 葆 华(6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財政的伟大成就	李 先 念(66)
十年来的商业	姚 依 林(70)
十年来我国的对外貿易	叶 季 壮(75)
十年来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对我国的技术援助	李 强(78)

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为軍事工作的繼續跃进而奋斗.....	賀 龙(79)
十年来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	罗 瑞 卿(82)
不断发展我国各民族的大团结.....	烏 兰 夫(86)
我国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汪 鋒(90)
科学战綫上的巨大胜利.....	郭 沫 若(95)
十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聶 荣 臻(99)
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十年.....	陈 毅(103)
中国人民胜利的国际意义.....	王 稼 祥(105)
共产党员应当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当是党的同路人.....	康 生(107)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最高統帥.....	刘 瀾 涛(110)

· 政 治 之 部 ·

最高国家机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議.....	(11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決定.....	(1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11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問題的決定.....	(114)
改恶从善 前途光明(人民日报社論).....	(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11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关于直辖市和較大的市可以領導县、自治县的決定.....	(1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116)
国务院任命的各项名单.....	(116)

人 民 公 社

公共食堂前途无量(人民日报社论).....	(118)
人民公社光芒万丈.....	賈 启 允(120)

对 外 关 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日本前任首相石桥湛山会谈公报.....	(122)
周恩来总理和石桥湛山先生的会谈的重大意义(人民日报社论).....	(124)

· 經 济 之 部 ·

用新的胜利迎接群英会(人民日报社论).....	(126)
-------------------------	-------

城 市 建 設

大跃进的产兒(人民日报社论).....	(126)
人民大会堂的艺术风格.....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人民大会堂設計組(127)

工 业

薄一波副总理在全国钢铁生产竞赛评比广播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28)
------------------------------------	-------

交 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群众短途运输运动的指示.....	(129)
------------------------------	-------

开展短途运输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社论).....	(130)
--------------------------	-------

貿 易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一九五九年度农产品收购工作的指示.....	(13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	(132)
市场形势的回顾和展望(人民日报社论).....	(133)

· 国际之部 ·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会谈联合公报.....	(136)
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前夕发表的公开信.....	(136)
赫鲁晓夫在华盛顿机场的讲话.....	(137)
赫鲁晓夫在白宫招待会上的讲话.....	(138)
赫鲁晓夫在白宫赠送纪念品给艾森豪威尔.....	(138)
赫鲁晓夫在华盛顿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说.....	(138)
赫鲁晓夫在华盛顿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答记者问.....	(141)
赫鲁晓夫同美国国会领袖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座谈.....	(143)
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苏联大使馆宴会上的讲话.....	(146)
赫鲁晓夫在纽约市长华格纳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148)
赫鲁晓夫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演说.....	(149)
赫鲁晓夫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答记者和实业界人士问.....	(152)
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154)
赫鲁晓夫在洛杉矶市政厅宴会上的讲话.....	(159)
赫鲁晓夫在约翰斯頓和斯庫腊斯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162)
赫鲁晓夫在旧金山同美国工会领袖的谈话.....	(165)

赫魯曉夫在舊金山市長和實業界代表舉行的宴會上的講話.....	(170)
赫魯曉夫同志訪美的成就（人民日報社論）.....	(178)

裁軍和禁止原子武器問題

蘇聯政府關於全面徹底裁軍宣言.....	(178)
解決裁軍問題的新途徑（人民日報社論）.....	(178)

印度支那問題

蘇聯政府關於老撾局勢的聲明.....	(179)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老撾局勢的聲明.....	(180)
越南政府發表聲明歡迎蘇聯政府關於解決老撾問題的建議.....	(181)
老撾愛國戰綫黨中央發表聲明支持蘇聯關於重新召開日內瓦會議參加國會議的建議.....	(181)
國內外大事記.....	(182)
報刊參考資料索引.....	(186)

新華半月刊

XIN-HUA BANYUEKAN

慶祝建國十周年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為“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而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劉 少 奇

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到現在，已經有十周年了。

中國革命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偉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開始改變了世界的面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以蘇聯為主力軍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歐亞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都表明社會主義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沒落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中國革命的勝利，進一步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中國革命把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戰綫打開了一個很大的缺口，使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制度遭到致命的打擊。新中國參加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起，結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在歐亞兩洲連成一片、團結友好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對於一切曾經遭受或正在遭受着帝國主義壓迫的落後國家的人民，中國革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感覺到，中國人能夠做到的，他們也應當能夠做到。所有這些，清楚地說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力量對比，已經有了新的變化。

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得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徹底的解放，使得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能夠一日千里地、突飞猛進地向前進，從而迅速地改變着中國貧窮和落後的面貌。

中國在全國解放後的最初三年間，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順利地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使工農業生產一般地達到了和超過了舊中國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國人民執行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使工業總產值增長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一，農業總產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使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從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七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中國建立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們開始執行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年出現了國民經濟的大躍進。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六，

農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在去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躍進。同一九五八年相比較，今年工農業總產值，計劃增長百分之二十，工業總產值計劃增長百分之二十五點六，農業總產值計劃增長百分之十。鋼、煤、冶金設備、發電設備、金屬切削機床、棉紗、原木、糧食、棉花等項工農業主要產品的計劃產量，都將完成、超過或者接近第二個五年計劃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標。中國社會生產力這樣飛速的發展，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比擬的，當然更不是在舊中國的條件下所能夢想的。

馬克思說得完全正確：“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在中國，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沒有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會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迅速發展，就不會有象今天這樣全國人民精神煥發、意气昂扬地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局面。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的希望和異常光輝燦爛的前途。

中國人民十年來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的總路綫、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路綫、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綫的勝利。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反復地闡明了這樣的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繫，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①一方面，中國革命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正象俄國的孟什維克一樣，他們用一道“萬里長城”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隔開，看不到這兩個革命之間的相互聯繫，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這個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的前途。另一方面，“左”傾機會主義者又類似俄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混淆了民主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曾导致中国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针是：一方面，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明确地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把这两个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尽一切可能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不停顿地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紧紧地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胜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任何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提不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都不可能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概括，叫做“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①。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国，它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贫农和雇农又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问题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旧中国的反动统治是极端野蛮的，人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进步的革命家大批地受到逮捕和杀害。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入农村，领导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斗争，达二十二年之久。党采取了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的方针（党的这个方针一直继续贯彻执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中），而不是采取与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资产阶级的方针，就使党在农村中建立了强大的可靠的革命堡垒，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把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纪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间取得了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后备。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革命战争，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伟大的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军队，积蓄了革命力量，培养了干部，并且使党的领导在各方面都

取得了丰富经验。

因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就能正确地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正确地划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封建主义的保护者和同盟者，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凶恶的敌人，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要求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因此，他们有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可能。但是，他们有软弱性，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经常处于动摇的中间地位。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联合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同他们的妥协性进行斗争。实行了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就达到了壮大革命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的目的，巩固地保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割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联系的机会主义者和混淆这两个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农民问题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资产阶级的問題。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线，把民主革命看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不去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主要地依靠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并且对于资产阶级只进行联合，而不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样，他们就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情况下，就使革命遭到失败，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需要抓住时机，进行决定胜负的斗争的时期，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不敢争取胜利，甚至要阻止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願意联合各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錯誤地把中間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击方向，否認在民主革命中有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中間力量的必要和可能。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进行斗争，不进行适当的联合，更不願意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結果也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使革命不可能得到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他們都忽視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毅力，在反动統治时期，不承認我們能够在农村站得住脚，能够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能够经过农村包围城市并在最后达到夺取

城市的目的。所以，“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调换位置。例如王明同志，他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人，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了全党，从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使一个革命胜利接着一个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旧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机构，从而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这就顺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的最主要问题即政权问题上，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因而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由于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一分心也没有忘记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就十分注意地确立了并且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国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国内的主要矛盾则将由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位给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系列的基本政策。中国人民在全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虽然还必须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在全国很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任务，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已经在一九四九年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通过国家的力量，没收官僚资本，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积极地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并且使这种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

在一九五二年年底，当恢复国民经济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规定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在提出这条总路线的时候，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一方面同企图扼杀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团结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国内，一步不停地继续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这条总路线，是引导中国社会由当时的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个体经济的复杂的经济结构，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的路线。当时，有些人否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他们或者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或者企图把革命停止下来，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肯定必须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从右的方面来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党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又肯定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是逐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须逐步的，从而否定了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资本主义消灭得干干净净的“左”的错误观点。

我们在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步骤。

我们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在土地改革以后，紧接着广泛地发展了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互助组织。这种互助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第二步，在这种互助运动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主要的生产资料还是私有的，这种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我们把它叫做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就是实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同观点的争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还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因此，要很快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种观点已经被事实驳倒了。我们在基本上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任务。

有一种观点，认为迅速实现合作化，势必降低农业生产。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驳倒了。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合作化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并且上

升得相当快地。

还有一种观点，認為我們这样迅速地实现农业合作化，会妨碍农民的团结，就是说，除了富农以外，富裕中农也会不滿意甚至反对我們，而支持我們的將只有比較貧苦的农民。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駁倒了。由于我們对富裕中农采取团结的政策，对富裕中农入社的大农具和牲畜采取逐年偿还代价的政策，由于合作社生产的逐年上升，絕大多数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是基本上滿意的。

总之，事实証明，我們紧接着土地改革之后“趁热打铁”，不停頓地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进行农业合作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如果我們在土地改革以后把革命停頓下来，讓农村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发展起来，听任农民向两极分化，那在以后要实行合作化，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就会困难得多。

我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目的。一般說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級形式，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供給原料、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对私人资本主义商业采取讓它們經銷代銷的办法；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級形式，是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一定年限內給資本家一定的年息。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上，我們党内也发生过一些不同观点的爭論。

有一种观点，認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只应当加以利用，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和改造，或者说我們限制得过多，改造得太急了。这实际上是企圖讓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保持下去。资本主义的剝削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同一个社会里，不是这个战胜那个，就是那个战胜这个，长期并存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观点，認為我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又是逐步改造，又是实行贖买，又給资产阶级选举权，又給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政治地位，“太妥協了”。他們認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們还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統一战线，是原則上不可許可的。他們要求用对待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政策去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即沒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或者从国民經济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简单的、迅速挤垮的政策，并且剝夺資本家的选举权。这些人忘記了，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贖买政策，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这是馬克思和列宁多次說过的。至于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一定要剝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的問題，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也講过：“限制选举权的問題是某一国家中实行专政的特殊問題，而不是专政的一般問題。”^⑨

我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是不是采取了“阶级調和”的政策呢？当然不是。这种怀疑是完全不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誤解或曲解。实际上，我們为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极其坚定的阶级政策，同“阶级調和”政策沒有絲毫相同之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完全証明了这一观点。

总之，我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并且在逐步改造的过程中有条件地利用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設的进行，而結果是我們能够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并且要把资产阶级分子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当然也是完全适合中国条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

我們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并不要有些人所說的，拖长了改造的时间。相反，改造进行得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們已經实现了农业的高級合作化，而緊跟着在一九五六年，就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手工业的合作化。这就是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到七年的时间內，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誰战胜誰”的問題。我們在解决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沒有引起什么破坏，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

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結束了呢？有人認為是結束了，再不需要进行任何革命了。我們認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結束，还必须繼續进行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現在，我国的資本家还拿定息，在經济上作为两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失。即使资产阶级在經济上作为一个阶级完全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而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还会利用这些情况，伺机向社会主义举行进攻，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有

时他們的进攻还会达到非常猖狂的程度。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决不能局限于经济战线上，还必须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馬克思主义仍然必須在斗争中发展。”^①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象波浪的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现尖锐，有时候比較緩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阶级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

为了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和处理这两类矛盾，并且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针。在一九五七年，我們党发动了調整人民内部关系的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斗争。結果是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and 主动性，大大地打击和削弱了剝削阶级在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中的反动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我們党提出了“政治挂帅”的方针，加强了党对經濟工作及其他各种工作的领导，調整了中央与地方、领导与被领导以及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同时，党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口号，鼓励革命性的試驗和群众性的发明創造；领导群众修改或者廢除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了进行教育革命，党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针。由于采取了这一切革命的措施，毛泽东同志所說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我国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在一九五八年春天，我們党及时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鼓舞下，全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就在一九五八年实现了国民經济的大跃进，在全国农村中实现

了人民公社化。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發展，也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成就。这是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彻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所得到的結果。

在区别两类矛盾、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問題上，在我們党内也有过不同观点的爭論。我們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持了正确的路綫，批駁了党内各种錯誤的观点，因而就能够团結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有人說，在过渡时期存在着敌我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可理解的。他們認為不要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矛盾。这种观点是錯誤的。划清这两类矛盾，对于如何正确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如何正确地处理劳动人民内部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种矛盾，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实践的意义。

在现在的中国，不但是存在着敌我矛盾，还存在着大量的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例如：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間存在着差別而产生的矛盾，由于劳动人民中間遗留着剝削阶级的习惯上和思想上的影响而产生的矛盾，等等。至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間的矛盾，以及人們由于認識上的正确和錯誤、先进和落后的差別而产生的矛盾，則是从来就存在，現在也存在，并且在以后还要永远存在下去的，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些矛盾的性質和解决方法已經和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同了。認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者在阶级完全消灭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人民内部就不存在矛盾的观点，是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錯誤的观点。

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矛盾，都必然地要在我們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济生活中表现出来，也必然地要在我們党内的生活中反映出来。因此，我們必須学会正确地認識并且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才能彻底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完成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識分子的改造，并且調整人民内部的关系，把我們的事业順利地推向前进。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矛盾的統一和斗争，矛盾的解决，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動力。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果不注意划清这两类性質不同的矛盾，就会产生几种錯誤傾向：看不见敌我矛盾，或者把敌我矛盾看成人民内部矛盾，不知道对待敌我矛盾必須采取专政的方法，即孤立、分化、惩办和鎮压的方法，而

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处理敌我矛盾，这就必然要犯错误。反之，看不见人民内部矛盾，夸大敌我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不知道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民主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而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不用说服的方法，而用压服的方法，这也必然要犯错误。此外，这两类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如果矛盾转化了，而我们的处理方法不随之而转化，也必然要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具体事例是不少的，因此，认真地认识这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也有一些人担心，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会助长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造成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所有这些都错了。

我们实行这个方针，是因为我们对党的领导，对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具有充分的信心。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实行这个方针，是为着促进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为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还有着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时候，实行这个方针，是为着便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战胜资产阶级，肃清它的影响，而不是容许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这个方针也适用于在政治方面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仍然要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思想仍然要在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中扩大自己的阵地。对于人民内部各种不同的意见，必须让它们充分发表出来，采取批评、说服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辩论，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不错，资产阶级会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一切优势都在无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利用这个口号来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我们说来并没有什么可怕。我们从来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合法的。我们从从来就公开宣布，在我们的园地里，社会主义的百花是应当盛开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是应当锄

掉的。问题在于：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够有效地消灭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以前，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毒草总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并且总是经常以冒充社会主义香花的姿态出现。当人们缺少同毒草进行斗争的经验的时候，他们常常不善于分辨香花和毒草；甚至还会把伪装了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当做社会主义的香花加以欢迎。在我国文化工作的某些部门中，曾经有些同志因为害怕长出毒草，只准许他们所认为是香花的东西生长，其结果，许多对社会主义有益的香花被误认为毒草而受到了压制，相反地，许多有害的毒草反而能以伪装的态度在暗处滋长起来。这些同志的想法是错误的，幼稚的。其实，潜伏地下的或者以伪装面目出现的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对无产阶级专政说来是更为有害的。让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以本来面目长出来，并不是坏事，相反地，是很好。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锻炼人民群众辨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人民群众同毒草作斗争的本领，从而达到放社会主义百花，锄反社会主义毒草的目的。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同资产阶级右派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击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

事实证明，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恰恰是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中的领导地位，丝毫也没有削弱这个领导地位；是提高了人民群众同反动思想作斗争的能力；丝毫也没有削弱这种能力。这是在我国条件下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策。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开创了一个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对于大跃进的事实，人们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有人说，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大跃进不是正常的现象，在经济建设中组织群众运动，只会造成生产秩序的混乱，即使一时能够跃进，也必然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因而国民经济的跃进局面不可能持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在经济建设中组织群众运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自觉的事业，不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就不可能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解放了的、团结起来和組織起来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创造力量。在去年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中，几千万人废寝忘餐，不辞劳苦，表现了热情奔放、干劲冲天、敢于创造新生活的共产主义精神，结果就使我国钢铁工业能够逐步合理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并且加速了钢铁工业发展的速度。目前布满全国的无数中小型水利工程和几十万个中小型企

也都是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发挥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办起来的。由于发动了群众，开展了“比先进、赶先进、学先进”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许多大型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迅速的提高，许多基本建设工程，大大地节约了投资，缩短了竣工的时间。事实证明，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来，就能够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的局面。

这样的群众运动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偶然的现象。迅速地改变我国贫穷和落后的面貌，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强烈愿望。他们既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解放，他们的这种愿望就必然要表现为行动，成为不可抗拒的高屋建瓴之势。在正确的领导下，这种群众运动一定能够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跃进发展的最积极的、经常的因素。我们的群众运动是在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把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和物质鼓励结合起来，而以政治为灵魂、为统帅。因此，在党的领导下，就能够形成和经常地保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群众性的运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在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使广大人民群众经常地处于主动、力争上游，并且依靠工人、农民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来不断地增加现代化生产工具和发展现代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只要我们这样做，我国国民经济跃进的局面就能够持久地保持下去。这是毫无疑问的。

群众运动发展起来以后，是会要破坏一些原有的生产秩序的。但是，它所破坏的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旧秩序，而在同时又建立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新秩序。在一九五八年，我们通过开展群众运动，在企业中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行了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实行了领导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几方面在党委领导下密切结合的制度，同时有领导地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结果就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有领导地改变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就是充分发挥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要做到这样，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同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只要我们这样做，就能够推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就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能够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地跃进。

列宁说过：“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

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⑨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中，我们真正看到在我国出现了这样的群众性运动。非难群众运动的人，他们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画脚，向群众泼冷水，散布泄气、埋怨和悲观的情绪。他们对待群众运动，完全不是共产党人所应有的满腔热情的态度，而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

有人说，采取跃进的速度，会违反客观经济规律，会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但是，我们的事实完全不是象这些人所说的。我们的跃进，恰恰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上出现的新事物。客观经济规律是不能违反，而必须遵从的，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也不可能有什么国民经济的跃进发展。我们党的总路线包括一套“同时并举”的方针，就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后来大家给这套方针一个通俗的名称，叫做“用两条腿走路”。采取这样的方针，就可以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避免各种片面性，例如：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只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只重视大型企业而忽视中小型企业，只重视中央对工业的统一管理而忽视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只重视洋法生产而忽视土法生产，等等。这就是说，我们党的总路线正是要求在高速度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把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注意各种比例关系，遵从客观经济规律。从去年以来的大跃进中，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总的说来都是协调的，相适应的。虽然出现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调现象，但是很快就被我们发现并且克服了。这种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调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出现了也是容易克服的。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就可以保证不会发生长时期的、全局性的比例失调现象。

当然，我们必须做好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尽可能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互相协调地向前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又要有多速度，又要有综合平衡。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在高速发展中有可能出现某些不平衡现象。但是，我

們不应当前怕狼，後怕虎，貪圖安寧，用不適當的降低速度的辦法來達到平衡。只要我們注意總結經驗，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在高速度的中求平衡是能够做到，也是應當做到的。

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不可能每年都是一樣的。有的年份較高，有的年份較低，這是正常的現象。可以肯定，我們的經濟總是逐年增長的，而且我們是能夠保持持進的發展速度的。

非難大躍進和群眾運動的人，同時也非難我國農村的人民公社。他們認為人民公社“辦早了，辦糟了”，“超過了社會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群眾的覺悟水平”。這種非難，沒有任何站得住的事實根據和理由。

認為人民公社的發展沒有客觀必然性的觀點是不對的。他們沒有看到，人民公社是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是中國幾億農民群眾為着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它是去年大躍進中農業生產大發展、農田水利大發展、農民辦工業的積極性和農民社會主義覺悟大高漲的產物。我國廣大農民群眾看到，要辦水利，辦工業，綜合發展農業的各種經濟，在各種較大規模的生產事業上實行勞動協作，所有這些，都要超出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規模，要求在原來合作社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建立某種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組織形式，這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擁有幾千戶以至幾萬戶的人力，幾萬畝以至幾十萬畝的土地，能夠更合理地安排人力和利用自然資源來發展農村經濟，並且有利於逐步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農民群眾所迫切需要的文化教育事業和集體福利事業，在人民公社中也能夠大大發展起來。由於舉辦公共食堂、托兒所等集體福利事業，節省了大量勞動力，特別是使大量婦女勞動力得到了解放。農村人民公社雖然還只成立了一年，但是它在實踐中已經充分顯示了它的偉大生命力。所以，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合乎中國農民要求迅速發展農村經濟、改變農村貧窮和落後所說的一個偉大的群眾運動，是在中國條件下合乎歷史規律的群眾運動。這樣的運動，不是什麼人喊一下就會出現的，也不是什麼人反對一下就會垮台的。

有人以為，現在的人民公社還是實行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那就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沒有什麼區別，就沒有必要組織人民公社。他們看不到，人民公社在原來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內容，因而二者是有很大區別的。在人民公社內部，實行工、農、商、學、兵相結合（其中所說的農，包括農、

林、牧、副、漁五業），在組織生產的同時又組織生活，實行國家在农村的基層政權機構和公社的管理機構的合一，這些都是原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沒有的。尤其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現在雖然還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生產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集體所有制是基本的，公社的所有制是部分的；但是，這部分的公社所有制是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沒有的，它包含着某種程度的全民所有制成分。由於公社可以逐年從生產隊中提取一部分積累用於社辦企業，由於社辦企業的發展，並且由於國家對公社的援助，公社所有制部分必將逐步擴大，以至轉變為公社所有制是基本的，而生產隊的所有制只是部分的。目前的公社所有制雖然還是部分的，但正是這部分公社所有制代表着人民公社的偉大希望和偉大前途。只要公社的部分所有制轉變為公社的基本所有制，那就為我國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奠定了可靠的基礎。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方面，現在基本上實行按勞分配的工資制度，同時也實行部分帶有按需分配的萌芽性質的供給制度，這也是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所沒有的。許多人民公社採取適當部分的供給制度（一般說來，占社員總收入中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它在目前的主要作用，是保證喪失勞動力的人和兒童的生活。這是在我國農村實行社會保險，幫助多子女家庭以及其他負擔較多的家庭的一種很好的辦法，是適合於農民群眾現在實際生活的需要的。當然，這還不是實行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的原則。

有人以為，人民公社的性質只能是共產主義的，必須完全實行按需分配的原則，否則，就不能稱為人民公社。因此，他們認為，在現在條件下辦人民公社只是一種脫離實際的空想。他們對於人民公社作了完全機械的理解。他們不了解，我國農村現在的人民公社是一種基層的社會組織形式，具有上述的各種特點，因而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可以容納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不同程度的生產力和与之相適應的不同水平的生產關係。對我國說來，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既適合於目前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也將適合於將來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既適合於目前的實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將適合於將來的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制度。有理由相信，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在我國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之後，也將是一種適當的基層社會組織形式。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公社制度是一種發展過程。在我國農村中，人民公社這種社

会組織，能够推动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将反过来促使人民公社制度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发展。有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組織以后，我們实际上找到了在我国条件下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至将来在农村中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如果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就能够实现公社的全部理想，这是錯誤的。如果因为人民公社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就认为人民公社办得太早，最好不办，办了也要讓它散掉，更是完全錯誤的。

非难我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难我們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这些非难党的总路綫的人，是些什么人呢？在我們自己的队伍中，就是那些右傾机会主义者。他們是资产阶級思想在党内的代表。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恶毒地攻击我們的时候，他們竟借口我們工作中某些早已被党中央发现并且已經糾正了的缺点，否認我們工作的伟大成績，把我們的伟大事业說成似乎是一团漆黑。他們企图阻碍我們的事业前进，阻碍今年的繼續跃进，阻碍党的总路綫的貫徹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右傾机会主义是我国目前的主要危险。同右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克服右傾机会主义，扫除它的影响，是我們党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

我們党的总路綫是正确的，我們得到的成績是伟大的。現在，我們正在胜利地进行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掀起了一个新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大高潮，有力地回答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同时也回答了右傾机会主义者的攻击。

我們的伟大事业正在胜利地前进。我們的党不只是同中国人民共命运、同呼吸，而且我們从来认为，我們的事业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部分。在中国革命和建設中，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給了我們以很大的帮助，全世界劳动人民和各国进步势力也給了我們以很大的同情和支持。我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日益增强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和团結。我們的口号是：“中国人民大团結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結万岁！”。依靠这两个伟大的团結，我們的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們的一切胜利，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証实和新胜利。曾經有过一种說法，认为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不适用于經濟落后的国家，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东方。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后，又有一种說法，好象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东方国家，不适用于西方国家。所有这些說法，都是资产阶級反动派和他們的仆从們的奇談怪論。事实上，自从馬克思主义出現以来，不論在經濟先进的国家，还是在經濟落后的国家，不論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每一次历史事变和每一次革命的經驗，恰恰是反复地証明了馬克思主义的正确。各国人民群众的斗争和革命，都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但是，不管各国革命有多大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一切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共同的历史軌道，正象地球圍繞太阳旋轉不能离开自己的軌道一样。

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毛澤东同志有一个著名的概括的說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中国共产党在毛澤东同志领导下，一贯努力的就是，使自己能够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設中的各种問題。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們这样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在革命和建設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的結果，無論如何，这总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当然，中国的革命和建設，带有自己国家的特点。但是，某些重要的特点也可能在别的一些国家中重新出現。就这方面來說，中国的經驗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国际意义的。

讓我們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前进！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6頁。
- ② 毛澤东：“在晋绥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 ③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7頁。
- ④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26—27頁。
- ⑤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8—459頁。

【“红旗”1959年第19期】

伟大的十年

周恩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们不管政治见解如何，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发生了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由人间地狱的奴隶一变而为自己命运的大无畏的主人。全国人民以欢乐的心情回顾着已经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同时充满信心地瞻望着将来。

讓我們來看看，中国十年来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人們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得到什么主要的教训。

尽人皆知，十年前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钢产量占第二十六位；发电量占第二十五位；煤产量高一些，占第九位；就是比较发达的棉纺织业的产品——棉纱的产量，也只占第五位。全国产业工人只有三百万人，不足全国人口的千分之六。老大的中国素称以农立国，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间，小麦、大米和棉花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进口。根据海关统计，一九三三年曾进口粮食六十亿斤，一九四六年曾进口棉花六百万担。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国家财政连年入不敷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

当时中国的情况如此悲惨，以至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八年二月間向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行政会议宣读的声明中，不得不承认美国不断倾注的大量援助，无法挽救中国的经济危机；并且断定“中国缺乏原料和工业资源”，在最近的将来难于成为第一流强国。一九四九年八月間，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艾奇逊，在他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嘲笑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的“种种诺言”，预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任何政府也不会得到成功。

但是，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北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开幕式上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誰的預言应驗了呢？

按照調整以后的一九五九年计划的預計完或致（現在已經可以看出，这个计划的大部分指标都将超额完成），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将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四点三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将增长十点七倍。钢产量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吨，比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长七十五倍；煤产量将达到三亿三千五百万吨，比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增长九倍多；发电量将达到三百九十亿度，比一九四九年的四十三点一亿度增长八倍多；棉纱产量将达到八百二十万件，比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八十万件增长三点五倍。在一九五八年，我国的钢、煤、发电量和棉纱已经分别跃居世界的第七位、第三位、第十一位和第二位。旧中国进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现代工业建设，到一九四九年，工业固定资产还不到一百三十亿元；而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工业固定资产，却达到四百五十亿元左右。旧中国发展电力近七十年，到一九四九年，发电能力还不到一百九十万千瓦；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发电能力，就等于这个数字的三倍以上。旧中国建设钢铁工业近六十年，到一九四九年，炼钢能力还不到一百万吨；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超过了这个数字的十倍以上。

帝国主义分子譏笑我們調整以后的一九五九年计划是“大跃进”。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調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三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大跃进。这种跃进的速度，是帝国主义国家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就拿我們的发展速度跟两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比较一下吧。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年中，我国工业生产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而美国是百分之三点七，英国是百分之二点九。在我国工业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美国工业比上年降低了百分之六点半，英国降低了百分之零点九。如果我們的速度叫做“大跃进”，請問他們的速